《眾位弟兄》的社會基礎：社會學的視野

呂大樂◆

[摘要] 當代社會正面對一個十分嚴峻的形勢，分化、排斥、衝突、仇恨遍佈世界各地。大部份人對此都感到焦慮、不安，可是回應的方式卻往往令矛盾、鬥爭變得更為激烈，而不是叫人冷靜下來，思考出路。各種意識形態的空洞內容表露無遺，而政客老實不客氣地只看眼前的利害關係，完全未能表現出具備遠見的視野。悲觀情緒充斥社會各個角落，對將來缺乏想像。《眾位弟兄》對當代社會的局面作出回應，切入社會現實。但怎樣才可以在當代社會的環境裡建立兄弟情誼呢？如何在一個已經失去平衡的制度裡重現關愛和團結呢？我們需要一種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的文化，來建設新的群體生活。

關鍵字：民粹主義、內在張力、不信任、調節的市場經濟

Abstract: Our contemporary societies are undergoing a very challenging time. Divisions, exclusion, conflicts, and hatred are found in most, if not all, parts of the world. Most people become anxious and restless. Yet, their responses often only bring an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Their

◆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

reactions have not really helped them calm down and look for an alternative. Nowadays, the hollowness of different ideologies is apparent. Politicians bluntly place their focus on short-term political calculations without even pretending to look at the longer future. As a result, pessimism prevails, and people are short of imagining their future. *Fratelli Tutti* offers a reac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cene and an intervention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ut how can fraternity be built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o-economic setting? How can caring, love, and solidarity be shown in an institution already out of balance? We need a culture buttressed in humanity and its value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social foundation of common life.

Keywords: populism, internal tension, distrust, regulated market economy

1 導言

當前世界正處於一種失序的狀態，不僅是戰爭已經發生，同時觸發更大規模軍事衝突亦絕非沒有可能。而令人擔心的是，預警經濟危機不再是信口開河，而民主制度出現了崩壞的現象，也已擺在我們眼前。在文化層面上，散播仇恨意識不是偶然發生的孤獨事件，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過去在頗長的時間裡能夠維繫大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似乎逐漸失去了原來那種調節、規範行為、慾望的作用，很多人覺得無所依歸，感到迷惘，世界各地都普遍彌漫著焦慮與不安。教宗方濟各撰寫《眾位弟兄》通諭，不單只回應了我們眼前所見到的全球形勢，而且要求大家重新「同坐一艘船上」：[1]「關懷我們身處的世界亦即關懷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將自己組織成一個生活在共同大家庭的『我們』。」[2]

本文嘗試從一個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眾位弟兄》通諭的信息。一方面，本文作者肯定它的信息的重要性以及對當代社會的意義，另一方面，則認為我們有必要，在宗教以外的範圍，思考如何建立能夠回應種種挑戰的制度、文化與組織。我們目前所身處的社會制度與環境，其實已陷入一種失衡的狀態，簡單的修修補補已不足以幫助我們將社會趨勢扭轉過來。當然，進行社會重建，談何容易。

1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30 號，2020 年 10 月 3 日。2022 年 10 月 6 日取自：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1PopeMeessage/3Encyclical/%E7%9C%BE%E4%BD%8D%E5%BC%9F%E5%85%84.pdf。

2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17 號。

不過，話雖如此，我們還是需要定出方向，開始踏上新的發展道路。

2 由解構到恐懼

當代世界所面對的挑戰可謂來自四方八面。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世界，曾經一度按意識形態而分割為兩大陣營，彼此持敵對態度，甚至在個別地方兵戎相見。但過去三十多年國際政治的變化和市場經濟的擴展，改變了原來的局勢，令人相信或者「世界已變得扁平」，全球以一體化的姿態示人。一時之間舊有的藩籬倒下，經濟、文化活動的流通，跨境跨區的連繫與合作，叫人意識到新的世界已不再局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所謂國際化聯繫，而是一個新興的全球化現象。

當全球化正以市場經濟的動力全速驅動的時候，眼前光景令人以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已經形成——市場經濟無孔不入，令舊時生產模式或經濟制度的爭論顯得過時，而儘管表面上的分歧仍然維持，實際上意識形態的論爭已變得沒有意思，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均已不再需要回應任何挑戰。至此，「歷史終結」之說成為普遍受落的看法。

諷刺地，「歷史終結」正好反映出很多人失去了歷史意識，沒有看到在表面的底下，是原來的老問題尚未解決，而更嚴重者是新的、更為廣泛的問題將會在不久的將來暴露出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到踏入二十一世紀的時期，繁華的外表叫人看得眼花繚亂。在那個新的「鍍金年代」，

社會福利的概念顯著弱化，同時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未受正視。隱藏於全球化底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除滲透到各個生活領域之外，還衍生出新的操作手段（如「金融化」的趨勢），令市場的邏輯進一步產生支配性的作用。直至出現了全球金融風暴，大家才恍然大悟，察覺到貪婪、短視的和毫無節制的利益追求、不擇手段的做事方式，一直沒有離開我們，連收斂一下都未曾想過。所謂制度的監管原來何其脆弱。而結果並不單只是民眾的生活受到衝擊，個別國家的經濟實力亦大受影響，而這又進一步對國際政治造成衝擊，埋下日後外交磨擦與矛盾逐漸升級的「炸彈」。在不同國家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國際政治秩序必然起變化，而出現國與國之間對立和敵視的現象亦難以避免。

理論上，當社會出現經濟危機，人民的生活遇上困難時，這也可以是集體對社會進行反思的機會。這裡所指的反思，不一定就是革命，又或者對現存制度的徹底否定。反思的結果也可以是要求制度有所改良，需要革新。無論是哪一種結論，這個反思的過程是相當重要，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思考，我們才會從個人想到集體，再而瞭解自己作為共同體的一分子，應該有何付出，如何做得更好。從前很多所謂的中介或中間團體的存在，能幫助個人與群體建立關係，再而在思考問題時，能兼顧自己的與他人的、集體的利益，較易從中取得一個平衡。不過，晚近十多二十年的社會狀況，卻似乎採取了不一樣的回應方法。而這樣的回應並不局限於某類國家，而是普遍地散見於世界各地，無論是發展中地區或者所謂已成熟發展的後工業社

會，我們可以見到群眾躁動不安，對身邊的制度、事物有很多不滿，但同時卻失去耐性，作出很多情緒化的反應，而鮮有對整個制度、架構有深入的檢討，提出新的原則、規範，並且尋求出路。所以，四處所見，是群情激憤，互相指罵，多於有建設性地重新思考當代社會「往何處去？」。

在社會學的理論文獻中，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受其內在矛盾所困擾，可以說是過去二百年來一直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這裡所指的不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且還包括 Polanyi、Schumpeter、Bell、Hirsch 等理論家的思想。Polanyi 早已警告市場社會存在內在張力，無約束的市場必然引來逆向的回應，但這種內部矛盾將會持續，以至當代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3] Schumpeter 視企業家精神為推動資本主義不斷發展、創新的主要動力，不過同樣因為社會內部的張力，企業家的創業動力會受到制約，以至日後逐漸衰落。[4] Bell 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這個問題，在文化層面上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出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它既要求個人刻苦，但同時又鼓勵享樂、消費。[5] 而 Hirsch 則提醒我們，當人所追求的是「位置性的商品」時，他們的滿足感已不再只在於擁有與否，而是跟他人作比較，追求從「社會擁擠」的環境裡脫身而出，優於別人。

3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Books, 1944).

4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5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這樣的取向令消費變為一種無止境的追求，難以節制。[6] 以上所舉出的只是一些文獻中較多人熟悉的分析，但相信已足夠反映社會理論對當代社會所存在的內在張力的看法。

人類的自滿與傲慢令很多人以為，甚麼衰退、危機、崩壞都不是新現象，每一次臨時的應變好像又可以將矛盾舒緩，社會很快便回復到平常的狀態。所以，儘管很多顯示全球化存在種種問題的「社會警號」早已陸續響起，人們卻不以為然。這是通諭中提到失去歷史意識的現象，人們不單只沒有總結過去的經驗，避免重蹈覆轍，而是沉迷於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華表象。到問題出現於眼前時，將一切歸咎於他人。危機的出現未有令人回到歷史，從中思考和反省，正面面對自己與社會的不足、缺失所帶來的後果，反之是即時想到抽出假想中的「敵人」，要他們負責。人們的回應是反精英，但同時也反移民、反受社會福利照顧的人士。他們的各種空泛的口號背後，是一份深層的恐懼；通諭中提到，空洞的用語正是這種恐懼的表現形式，其內容其實是一份不信任，既不信任制度、領袖，也不信任他人。近年民粹主義在世界各個角落漫延，就是由這種不信任、恐懼所驅動。而很多政客充份利用這些機會，尋求個人的短線利益，而不是為社會的長遠發展謀出路。

3 團結關懷的基礎

在當下的環境裡，教宗方濟各提出兄弟情誼、人際友

6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愛，是極為重要的信息。這不止回應了民粹主義，而且也切入了新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大環境。在這場世界性的疫情底下，我們可以見到大規模的疫苗生產，又或者國際組織的回應，可是卻未有見到全球的大團結。表面上，我們接觸到很多國際資訊，不過想深一層其實主要還是各自為政，談不上甚麼團結、合作。我們甚至可以感覺得到，在各國想盡辦法抗疫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並未有消減。看誰可以先一步走出困局，是這場競賽中的潛議題。在疫情影響，大眾受到種種折磨、病毒威脅的情況下，尚且如此，當局面稍為平靜之後，就更談不上團結、關懷。更嚴重的是，在這抗疫的兩三年間，全球大團結，對貧困國家、缺乏資源的社會人士更多關愛等，未曾認真地成為公眾議題——暫且不談行動，就算是只作口頭討論，亦一樣欠奉。

所以，教宗在通諭的信息可謂至為重要：「在這個時代，一切似乎都崩壞瓦解、反覆不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尋求團結。團結源於領悟到自己對他人的脆弱負有責任，並尋求共同締造未來。團結關懷的具體表現就是服事，亦即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懷他人。」[7] 我們需要關愛身邊的人，打開心扉，才有機會由恐懼、不信任、排斥等等的一個方向，重新回到一個重視尊重、信任、團結的環境。兄弟情誼、人際友愛既是理想，但也是指引如何起步的方向。

但本文作者作為一個社會學的研究員，我不可能不提問：那能夠促成兄弟情誼、人際友愛的社會基礎是些甚麼？

7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115 號。

怎樣才可以幫助社會上的大多數都接受而且實踐這些關愛他人的原則？怎樣做才可以將教會的呼籲變為人皆可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價值、態度？

簡單的說，兄弟情誼、人際友愛不可能純粹是主觀上的價值，只要人們在思想上起了變化，便足以帶來更重大的轉變。我在上文提到制度的崩壞，民粹主義抬頭，以至大家對社會失去信任，由猜疑、恐懼，再而發展為仇恨。怎樣重建一個可以建立互信、尊重和善待他人、相互合作、彼此平等對待的社會呢？我們必須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否則如何大聲疾呼，恐怕亦無補於事。

不能避免，有些工作是要在社會的層面上打開的。時下廣泛流傳的恐懼，部份源於個人擔憂會失去自己所得的，視身邊的移民、少數族裔及其他類別的社會人士為一種威脅。不少人提出跨代公義的問題，埋怨上一兩代人沒有充份照顧新一代人，可是他們自己也不接受社會福利，不願意分擔跨世代的社會照顧。很大程度上，他們覺得必須先保護自己，以自己為先。

這種自我保護的精神狀態乃由缺乏安全感而產生。因此，我們必須將個人於經濟結構、就業市場裡的處境，減少無節制的市場運行所造成的影響。在一方面，認真對待財產繼承的問題（不單只徵重稅，還要預防種種「逃稅」的手段），好讓經濟優勢不可以毫無約束地傳承，令人難以相信個人的努力可以戰勝家庭的庇蔭。

第二方面，一個社會必須考慮照顧不同技能、生存條件的人，以免他們陷於低收入或難以就業的困境。在後

面的一個問題上，我們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有些地方討論「基本收入」，也有地方努力令「最低工資」可以發揮最大的正面作用，各地條件不一（例如人口的年齡結構），各自有不同的方法。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這個關於基本照顧的問題的重要性，而處理得宜可消除社會上很多不必要的憂慮。這未必可以令人關愛他人，不過起碼少了一份疑慮，不再凡事先求自我保護。

第三方面是有關調節的市場經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處理經濟發展，由市場搖擺到政府（國有化、政府干預），並不就等於將問題解決。不過，過去的觀察也告訴我們，沒有節制的市場運作確實會帶來很多問題，而通常都是滯後的監管機制無法幫助我們預防機會主義行為的出現。由不同程度的「調節的市場經濟」取代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雖未至是完全一致的共識，但起碼阻力已大大減少。重要的問題不是關於調節的程度，而是現在很多國家都會重新思考，某些活動、界別是否應該完完全全服從於市場的邏輯。更開放地接受不同形式的非市場營運模式（例如：合作社），來處理生產或回應不同的需要，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全面擺向市場化的趨勢，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市場化、金融化的現象，對相關的活動（例如：教育）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如何檢討「調節的市場經濟」、「適可而止的市場運作」，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公眾參與上，過去的四十年出現了很多倒退的現象。個人減少公眾、社區參與，脫離各種志願組織，退回私人空間。高度個體化的存在，其實不利於民主參與。以往的

經驗告訴我們，個體化容易產生高度情緒化的反應，以集體群眾行為的形式參與其中。我們都明白，衝動的回應往往沒有解決問題，而且更未有認清問題的性質，對症下藥。如何重建有機的社會參與的橋樑、中間組織，刻不容緩。而我特別強調有機的組織，因為由上而下，不鼓勵自發參與的形式，必定事倍功半。而逐步重建自發的基層參與，除可以改善政府與市民的溝通之外，當大家能見到成效之後，更有助重建對制度的信任，令政治參與不會淪為情緒發洩的集體行為。

明顯地，建立兄弟情誼、關愛他人的制度基礎，一定不限於上文所談到的三個方面。以上的簡短討論，純粹拋磚引玉，希望促成交流。而我要強調的是，要實踐兄弟情誼、人際友愛，不可能沒有一系列的步驟、舉動作為配合。不過，與此同時，也需要明白，我們並沒有單一的方程式，大家照單全收，應用到個別地方，便已足夠。實踐兄弟情誼、人際友愛是一個既大規模而且複雜的工程，沒有簡單的答案。

4 小結

以上所講，最終必須回到教宗方濟各在《眾位弟兄》通諭裡表達的中心思想，這裡除了宗教的信息外，還有一種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的文化，來建設新的群體生活。對很多人來說，這不是老掉牙的說法嗎？大家還有需要討論的嗎？但這正是當代世界最為諷刺的地方，一些本來廣為人知的道理，多年以來在不知不覺間其實已經拋諸腦後。而正正因為對一些基本價值的遺忘，很多人面對逆境的時候，

未有回歸根本，反而轉向不信任、猜疑、嫉妒、仇恨，將個人的不滿發洩出來。在這個意義上，通諭的發表給大家一個提醒，進行反思、自省，看到他人，關愛他人，把兄弟情誼、團結關懷放回我們生活首要的位置。